

公共服务难以计量的价值

许林珠

联合早报，2012年1月11日

怎么看部长减薪报告把公共服务视为对私人领域薪金的“折扣”是不适当的。这正是社会和市场发生碰撞的地方，变成了对折扣的竞价战。所涉及的人的价值、部长的全天候繁杂工作和对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因为我们尝试用金钱来衡量而被削减了。

薪金不论是多还是少，都不能充分反映对工作的热诚和公共服务精神：我们希望这是推动新加坡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的力量。人民期望他们通过日常和重大的决策来塑造国家未来的命运。

在扮演这个角色时，今天的内阁成员不可能只是因为受到薪金的激励。他们不辞劳苦的处理部门事务，必须考虑国家的不同利益、加强同各国的关系以扩大我们的外交和经济利益、及在白天同公众进行沟通以了解基层的需求。在晚上和周末，他们还得处理社区课题、主持基层活动、并在每周接见选民时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

今天的反对党和一些公众含沙射影指出任政治职位的人，包括以前和现在，是为了“自肥”。这是很好用的政治辞令，却不容易佐证。不过，根据去年11月人力部和统计局联合发表的一份报告，新加坡公民2010年的名义薪金中位数（nominal median wage）是2588元。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这样说更可以激起公众的情绪。

收入分配结构的这种差别，是国家在讨论部长薪金时面对的政治差别的背景。在提到政治职位薪金检讨委员会建议的初级部长加上第13个月花红的年薪60万7750元或4万6750元的基本固定月薪时，还是会让人双眼发呆或愤怒得发红。这个收入差距是全球化造成的，也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委员会建议为薪金打40%的折扣——但以这样的方式来看部长薪金难道不是没有意义的吗？这样的概念把市场规范（私人领域薪金）和社会规范（公共服务）混淆了。

行为经济学家艾瑞里（Dan Ariely）在他的著作《可预测的非理性》（Predictably Irrational）中指出：“当我们把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分开时，一切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当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发生碰撞时，麻烦便会出现。”他以付钱给岳母的美味感恩节晚餐或者同妻子的性行为为例——你以后大概都没有机会尝到两者了。

同样的，把公共服务视为对私人领域薪金的“折扣”是不适当的。这正是社会和市场发生碰撞的地方，变成了对折扣的竞价战。所涉及的人的价值、部长的全天候繁杂工作和对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因为我们尝试用金钱来衡量而被削减了。

结果只能是薪金往下竞争，就像我们在志愿性社会福利领域所看到的——总裁和职员必须领取微薄的薪金来凸显他们为慈善所做的牺牲。即使是提供援助的机构、受益人和好心的支持者，也不愿意为这些福利组织的运作费用付出太多。

与其谈“折扣”或“牺牲”，担任政治职位者的薪金应该只有一个目的——确保他们的家人得到很好的照顾，钱的问题不会造成困扰或负担。这个水平必须设定在他们的专业同僚的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准。这正是收入基准概念适用的地方，但应该扩大到包括更多的人，例如平均收入最高的10或20个百分位数的国人。

以这样的方式来看，若薪金是设在合理水平，并定期检讨以确保不与参照群体的情况脱节，也不会出现诚信的问题。此外，也不会有借口进行寻租（rent seeking）行为来提升目前的生活方式，或为“将来的生活”做好准备。

对贪污的惩罚、贪污调查局的警惕及国家早年建立的公众举报的积极行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如果我们预期会有更多来自商界的人从政，一个让担任政治职位者申报个人利益并进行监督的独立、透明制度便至关重要。

新加坡并不缺乏人才。希望为国家、人民服务，具备战略思维的人才最终会如何选择，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政治哲学、政党欢迎他们加入的开放度、及他们是否会被要求可以很高的人民吓退。

目前的建议可能是最终方案的半步。在这个最终方案，我们的讨论将把担任政治职位者的薪金和他们改善人民生活和国家的德行脱钩。没有任何数额可以同把这工作做好的努力相称，若出现失职的情况则一分钱也不应该支付。

设定这些薪金结构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理性讨论的结果：对我们所要取得的治理素质（已经是国际闻名），以及对公共服务难以计量的价值表达敬意的各种方式的探讨。

作者是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叶琦保译。